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少中文教育机构推出了线上中文课程，这其中既有传统教学平台由线下至线上的转变，也有科技赋能的学中文应用软件的推出。在此背景下，线上学中文已成为不少母语非中文学习者的必选项。

线下学习转至线上学习

相比线下，线上学习中文方式更加灵活，选择更多。有的学习者会选择购买线上课程系统地学习中文，比如选择“锦灵中文(jinglelingo)”，看上的正是其面向全球提供的“系统化中文”及“中国传统文化”线上课程；也有学习者使用移动应用软件，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提升中文水平，比如选择“漫中文”，看中的是这款原创漫画App的趣味性——用户可以看漫画、听发音、看释义，也可以收藏标准普通话版的读音复习，还可以给漫画配音并分享。

无论学习者如何选择，疫情期间，线上学中文已变得常态化。

正在南开大学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白雪正是线下教学转至线上教学的亲历者。“学校的线上中文教学已开展了半年多，我也渐渐地了解了什么是线上教学。”白雪坦言，“刚开始上网课时大家都懵懵懂懂，现在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学堂云、雨课堂、腾讯会议等线上教学平台，在云端和老师及同学相聚，体验新的授课方式，分享交流学习心得。”

白雪观察到，在疫情暴发前，线上中文教育已有一定市场规模，在疫情的催化下，在线中文教学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主教室”。

线上学中文

玩出新花样

吴鹏娟

中文学习软件多样化

来自巴基斯坦的丹尼尔就读于山西大学，学的是食品科学与技术专业，学习中文已有1年。疫情暴发后，他的学习方式也转为线上。“Pleco”App是丹尼尔和喜欢学中文的朋友们常使用的学中文软件，该软件的优点是可以帮助学习者提高中文词汇量。

据丹尼尔介绍，“Pleco”内置两款实用的免费词典，且拥有简单快捷的搜索功能——只需输入要查找的词，即会出现一个按频率排序的综合结果列表。值得一提的是，该软件包含中文单词和拼音例句，并提供即时的中文转英文功能。同时还支持手写和语音输入，读取文件直接翻译等。

白雪注意到，身边很多朋友都通过在线学中文。“他们喜欢用TrainChinese、Pleco、HSK Online等软件。在线学中文不仅是新的学习方式，更是多样化的学习渠道。在线中文教育是线上教育的组成部分，对使用者来说，可以将不同的学习资源进行比较，也可以将线下教学的内容进行延展，深入理解并消化所学的知识。希望以后供大家选择的线上中文软件越来越多。”白雪如是说。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杨帆来中国已经5年，目前在山西大学攻读“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硕士学位。对他来说，学习中文的难点在于拼音和笔画，相关线上中文学习软件正好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除了多听、多说、多写，我和朋友们经常借助‘Pleco’‘百度汉语’等线上学中文工具。”杨帆说。

线上线下相辅相成

对母语非中文的学习者来说，线上中文学习在未来会占多少比重？对学习方式会有怎样的深远影响？

白雪认为，线上和线下教学各有千秋。“在信息化时代，线上教育的优点很明显。首先可以突破时间、地点的限制，学习者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学习；其次，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实现个性化的学习；最后，网课的教学资源丰富，媒体多样。但线下教学师生之间的面对面真实互动，是在线教育实现不了的。在未来，二者不应相互取代，而应该相辅相成。”白雪说。

对丹尼尔来说，适应线上教学还需要一个过程。“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足够的耐心，但对我来说，上网课时很难集中注意力。”

杨帆则对线上教学的录播课程比较肯定，因为“可以反复观看”。虽然学习者感受各异，但在线中文教学会成为未来国际中文教育的一部分，是大家的共识。

相关专家表示，大规模的线上学习及教学实践为今后国际中文教育网络化、信息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催生了新的中文教学模式、教学形态。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两年前，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应用语言学研一在读的张爱莲认识了刚从英国归来的曾担任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的学姐。在学姐的讲述中，张爱莲对于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心生好奇与向往，并如愿成为下一批赴英国的志愿者。经过1个月高强度的教学集训后，张爱莲踏上了前往苏格兰阿伯丁的旅程。

阿伯丁的中文课堂位于阿伯丁大学校内，在满足本校学生对于汉语学习需求的同时，面向全市及周边地区的中文爱好者，为他们提供从初阶到高级的中文学习课程以及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因此，张爱莲的学生年龄、教育背景跨度很大：下至幼儿园儿童，上至退休人员。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经历，或许最初有着不同的学习动机，但大部分都是源自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纯粹的喜爱以及对于世界多元文化的探索。这也是很打动我的地方。”张爱莲说。

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在苏格兰教中文

文化交流不只是单向给予

叶倩



张爱莲近照

学习中文对抗衰老

Diane是张爱莲印象深刻的一个学生，她的中文名叫张笛——名字来源于她很喜欢悠扬悦耳的笛声。花甲之年的张笛是个法国人，如今在苏格兰生活。她年轻时曾是世界游泳冠军，还曾被邀请到中国担任游泳教练，在中国一待就是十几年。由于平时训练工作繁忙，虽然张笛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很感兴趣，但她在中国期间没能有时间好好学习中文。如今，回到苏格兰的张笛主动报了张爱莲的一对一中文教学课程，准备挑战一下这门熟悉又陌生的语言。

“张笛很有想法和个性，兴趣爱好也很多。她喜欢滑翔、开机车，还打趣地跟我说自己学中文除了想了解中国文化，还出于害怕自己得老年痴呆症的缘故。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学习中文是对思维很好的锻炼。”张爱莲说。

让张爱莲惊喜的是，张笛具有非常强的主动学习意识，会直接和老师沟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她会跟我说自己是视觉型的学习者，所以希望我把重点知识做成PPT。直接读汉字对她来说比较困难，所以她会建议我尽量多为她加汉语拼音标注。”张爱莲回忆道。

文化也是语言教学中经常会谈论到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张爱莲和张笛经常探讨某

一文化元素在中国、法国和英国的异同，比如英国茶与中国茶的文化渊源以及不同国家的饮茶习惯。“在英国，早上有早餐茶、上午有公休茶、下午有下午茶，甚至就寝前也会喝茶助眠。这和中国人喝茶的习惯不太一样。”张爱莲说。

由于年龄原因，张笛的中文学习进度并不快。但是凭着专注和努力，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她的中文水平已经从汉语水平考试(HSK)三级提升到了四级，可以进行一些常见的中文话题交流和写作。而张爱莲也从张笛的身上学到了终身学习、开放探索的精神，收获了跨越国界的忘年之交。

从挑战到喜欢

另一个让张爱莲印象深刻的学生是一个在苏格兰上小学的12岁女孩，名叫Alba。她的妈妈来自尼日利亚，爸爸来自西班牙。由于家庭背景多元，Alba在学中文前已经掌握了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尼日利亚的一种民族语言。

“我刚开始并不知道她会这么多语言，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了她的语言天赋。她跟我说每门语言都学得很轻松，对语言学习上瘾了，听说中文很难，便想挑战一下。”张爱莲说。

Alba的语言天赋让人惊奇。由于她之前已经掌握了多门外语，在学习中文时，会拿中文与之前学过的语言进行比较，在语言差异中发现中文的独特之处。当张爱莲教她“是”这个字的含义时，Alba会追问老师“是”有没有变体，因为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里，人称不同，“是”的形式也不同。

“她的学习速度是一般小孩的两倍，我通常要用两倍的备课量来给她上课。她还特别喜欢刨根问底，当我教她怎么回答‘你好吗’之后，她会问我‘如果我觉得不好、我累了、我困了’，该怎么说。”张爱莲回忆道。

Alba还有独特的笔记方式。她把学习的每个汉字或偏旁都设计成自己能记住的图案，比如给飞机的“飞”配上飞机和翅膀的形状，写上基本的对话，还会加上文化的意义。比如，“红”象征着热闹、吉祥，“火”可以辟邪等。

除了中文知识的学习，张爱莲也会教授很多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艺术课程，比如中国结、

创意手链的制作等。Alba的动手能力很强，基本一遍就能学会。她还很喜欢老师教给她的中国舞，学会之后开心地录制视频，并与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Alba已经可以完成一些基本的日常中文会话，学习中文也从单纯的挑战心态变得喜欢上这门语言，并对中国充满了好奇。

英式中文与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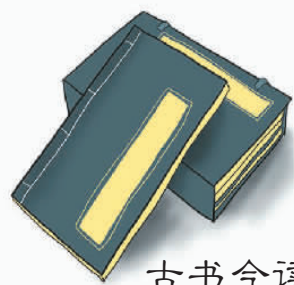
对于刚刚接触中文的外国人来说，汉字使他们感到神秘与好奇，但也是学习的难点。在教学过程中，张爱莲会鼓励学生多写汉字。但受母语影响，学生们还是比较习惯用汉语拼音而不是汉字来做笔记。于是，张爱莲一般会在学生达到中级汉语水平后，再对学生的汉字书写提高要求。

当学生书写汉字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写的英式汉语也经常让张爱莲忍俊不禁。比如有的学生会写出“我去商店昨天”这样的典型受到英语思维影响的中文句子。此外，张爱莲发现学生们对于汉字笔画的认知也不太敏感，常常分不清“土”和“士”、“人”和“入”，有时候会写出“我有干(十)个朋友”这样的句子。

在张爱莲看来，这其实和文化碰撞与理解的过程很像，摆脱从自身所在文化出发来评价其他文化的思维定式正是达成文化理解的第一步。在10个月的中文教学中，张爱莲感动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对中文语言和文化的好奇与喜爱，同时也感受到了由于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误解，这也让她更加有动力做文化交流的使者。

张爱莲认为，很多当地居民对中国的了解还仅限于北京、熊猫、长城等这些符号，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之前较为传统的印象，缺乏对中国更加细致和多面的认识。而当张爱莲和学生们在语言学习中细致讨论各种文化差异时，大家便可以在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补充和文化成因的分析中有效地促进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包容。

“文化交流不应当是单向的给予，而应该是不同文化的碰撞和相互了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一些文化误解，促进文化互赏互鉴。”张爱莲说。



古书今读(四)

了解古人心(上)——以学术为公 写书不署名到底图什么?

熊建

匈牙利有位作曲家说：“人们不需要为了享受鹅肝而去了解鹅。”同样的道理，钱锺书说得更透彻。一位读者很喜欢钱锺书的作品，想要登门拜访他。钱锺书婉拒：“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去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大师很谦虚，但是不合常理，看书毕竟不同于吃饭。一位读者看了一本很喜欢的书后，很自然地就会想了解作者其人其事。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现代作者对署名权非常重视，对侵权行为非常痛恨，但中国古代的作者好像并不这么想，因为很多古书都不写作者的大名。

《周易》的作者是谁？司马迁说是周文王，现在看并非如此。《诗经》三百篇，作者是谁？根本考证不出来。《周礼》，相传是周公写的，这一点连汉代人都不相信。所以，善于读古书的人，得谨慎。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古书，都不题写作者。若有，那一般是后人想当然添加的。

战国时期的韩非，写文章把法家思想阐述得很深刻。有人把他的书传播到了秦国。秦王嬴政

看到了，感叹道：“啊呀！寡人要是能和这书的作者见上一面聊聊，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写的啊，他是我同学。”

同样的一幕发生在汉代。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很来劲，说：“可惜朕不能和作者相识啊。”正好有个官员叫杨得意的在一旁侍奉，他听到后对汉武帝说：“作者是我老乡司马相如。”

秦始皇、汉武帝，看到了书，却不知道作者是谁，如果不是李斯和韩非同门、杨得意与司马相如同乡，连一国之主都无法知道作者高姓大名。所以，古人写书写文章，真的不习惯、不倾向、不愿意自己署名。

有人可能纳闷了：不对吧，很多古书的作者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当成书名了啊，比如《孟子》《荀子》《管子》《韩非子》，等等。

事实上，古书这么命名，为的是表明书中所言是出自哪里，彰显师门家法的。就像《论语》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一样，先秦子书一般都是某家后学记录、搜集祖师爷的文字、言论后编辑整理出来的。

还比如《晏子》，北宋官方出版的目录《崇文总目》里说了，这是后人采集晏子的事迹编写的，如果以为是晏婴自己写的就不对了。

为什么古人不重视自己的著作权呢？有学者推断，古人以学术为公，写书不是为了争名，对社会有益就好了。作家木心把这种“只留作品，不留作者”的行为，称为“大自然的作风”。

那为啥汉代以后的作者就不那么“急公好义”而非要把自己的名字标明呢？因为汉代开始，做学问学得好，是可以当官的。所以，当时的官方学者，门下弟子很多，他的学问与大名不愁没人传。

而民间学者、私人著述，写的书不被国家认可为功名利禄之桥梁，就少有人跟着学。作者要是死了，他的学问可能就会失传，“尔曹身与名俱灭”了。不信您看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写出了《史记》，不也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待后来君子吗？于是，他们就想想方设法把自己推销出去。在书里题写自己的名字，也就逐渐多了起来。